浅谈略萨小说的艺术特色

——兼谈拉美文学的某些特点

●孙大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拉丁美洲新小说时期。拉美文学以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质，在群星灿烂的世界文坛上夺得了无可争辩的地位。在这期间，拉美文学形成了社会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四大流派。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大师”。本文对他的创作道路及其优秀作品的艺术特色略加探讨，同时也兼及当代拉美文学的某些特点。

（一）

略萨于1936年3月28日出生在秘鲁的阿雷基帕市。在玻璃维亚的柯恰潘巴上小学。在利马和皮乌拉上中学。1950年至1952年在莱昂西奥·普拉多学校读书。这是一座半军事化学校，教员多为军官，他们对学生残酷虐待，这激起巴尔加斯·略萨的强烈不满。这也是他后来在文学创作中选择暴露军中黑暗题材的初衷。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圣·马尔科斯大学。为了维持生计，他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同时也进行创作。

巴尔加斯·略萨是个多产的作家，1952年开始从事于文学创作。他的成名作是196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城市与狗》。由于作品无情地揭露了军事学校中的黑暗势力，受到军事当局的非难。但是这并未能阻止作品的广泛影响，它被译成二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为此，作者获得1962年西班牙“小丛书”奖（这是西班牙小说最高奖）和“批评奖”（1963年）。继《城市与狗》之后，他平均每隔两三年就发表一部长篇小说，计有《绿房子》（曾获得1966年度“批评奖”和1967年度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文学奖）、《“大教堂”咖啡馆里的谈话》（1969年）、《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年）、《世界末日之战》（1981年）等等，九十年代出版了文学评论集《谎言中的真实》。这位秘鲁作家自1962年发表成名作后，经过近三十年时间，已成为西方声誉最高小说家之一。其作品不仅传遍了西班牙和拉丁美洲，而且吸引了欧美读者的注意。美国曾出版过他的研究专集。

（二）

不了解拉丁美洲的历史，便无法了解拉丁美洲的文学。拉美这片人类发现较晚的大陆，土著印第安人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在殖民统治时期，这里的土著人饱受奴役。直到1820年殖民枷锁才被挣脱。但胜利并未使拉美人民摆脱不幸，社会的不公正、军事独裁等阻碍着拉美的前进。现在，任何一个大陆也没有象拉美这样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贫困、毒品、外债、内战、政变、暴力……在拉美许多地方，与人们密切相关的日常现实不能公开地、自由地评论。社会和政治制度对宣传工具实行严格的检查。在大学里，教员、学生凡对官方有颠覆或不满的，都要被驱逐。整个课程都须按照政治上考虑加以安排。

拉美这种特殊的环境，给作家们造成一种极其特殊的境况。“从一种意义上说，人们（作家们的真正的或可能的读者）惯于把文学视为与生活问题和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社会里一切被压抑和歪曲了的事，将被提出并加以描绘和谴责。他们指望小说、诗歌和戏剧，同官方文化中流行的那种粉饰和歪曲现实的政策相对抗，并在这种政策的牺牲者中唤起变革的勇气和希望。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也赋予作为一个公民的作家一种在道义和精神上的领导权；只要他身为作家，他就得按照人们心目中期待他担任的这种角色去行动。……在拉美国家里一个艺术家，只作为艺术家，会成为一种道义上的犯罪，政治上的罪恶”。（《社会的责任和拉丁美洲作家》马·巴·略萨著，下同。）这一传统，使拉美作家无时无刻不意识到这种压力。除了以上这种道义上的外在压力之外，还有一种文化上的内在自觉使拉美作家负起这种政治责任。“作家在他的艺术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现不发达状态的种种障碍和不幸：不平等、不公正、剥削、歧视和虐待，不仅是农民、工人、职员和少数民族的负担，它们也是文化生活向前发展的社会障碍。在一个文盲比例占总人口的50—60％的社会里，文学怎么能够存在呢？在一些缺乏出版社，没有文学出版物，只有自费才能出书的国家里，文学怎么能够存在呢？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生活的物质条件（缺乏教育，维持生活的最低薪金等等），建立起一种文化上的隔离，就是说：阻碍大多数居民买书和读书；那么，文化和文学生活又如何能够发展呢？而且，除此以外，如果政府当局在报刊、宣传工具和大学里建立一种严格的检查制度，拉美作家怎么能对社会和政治的问题漠不关心呢？

拉美作家在他艺术的实践遇到重重阻碍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应该在政治上觉醒，并服从社会责任的种种压力。”

所有这些，使得拉美文学别具特色。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成为文学的中心题材。因此，拉美作家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对现实的高度敏感性。优秀的拉美作家常常也是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参加社会变革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不胜枚举。他们对社会的强烈干预意识可以说达到了极端，这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学中是罕见的。略萨的创作中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西方文学界把他和美国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主者德莱塞相比，称他为“拉丁美洲的德莱塞”。的确，略萨的作品都以政治和社会为题材，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富于批判精神。

在略萨的成名作《城市与狗》中，作品描写了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的士官生如何深受反动当局的压迫，描写了那个腐朽的社会如何迫使青少年走上堕落的道路，描写了人与人之间是怎样尔虞我诈、弱肉强食。

巴尔加斯·略萨认为，现行社会如同一条毒蛇，它有三张血盆大口。即：军权、政权、教权。它们每日都在吞噬着无辜的善良人。所以他在第二部长篇小说《绿房子》中，通过一座妓院的兴衰史，描绘出广大的下层人民，特别是印第安人的悲惨生活，同时还揭露了腐朽社会的主要支柱，军队、教会和地主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第三部长篇小说《“大教堂”咖啡馆里的谈话》叙述奥德利亚反动军事政权的内政部长堂·卡约的下台经过，并以此来反映社会各个阶层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

第四部长篇小说《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通过派潘达雷昂组织军中流动妓院——劳军队一事的描写，对军事当局的腐败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第五部长篇小说《胡利亚姨妈与作家》反映了秘鲁光怪陆离的畸型社会。其中有对种族歧视政策的嘲讽；有对被政府雇佣的专政工具——警察的揭露。

第六部长篇小说《世界末日之战》是描写巴西内陆高原卡奴杜斯农民起义的。这是一个前辈作家曾写过的题材。略萨认为卡奴杜斯起义对巴西的觉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小说所揭示的社会矛盾在今天的拉丁美洲依然存在，其中尤其是阶级矛盾，并没有丝毫的缓和。当年压迫农民的大庄园主依然存在，当年镇压农民起义的资产阶级专政依然存在，何况还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威胁。略萨认为“卡奴杜斯的悲剧就是拉丁美洲国家现实的总结”。

（三）

文学作为艺术，首先要有作为艺术品所必不可少的特质：表现力的丰富、技巧上的创新。如果把文学看作是社会和政治上的目标的具体化，文学的功能和实践就会被歪曲。如果把文学的最值得赞美的价值视为它所提供的客观现实的见证，如果把文学看作是社会上所发生的事件的真实记录，文学、历史和社会学之间就没有区别了，文学也就不再为文学了。如果文学作品的意图在于说教，就会失之浅薄和简单化。略萨的作品在注重内容的同时，更没有忘记作品的艺术性，这可能是略萨作品具有巨大价值的原因。在结构上的锐意创新、大胆探索是略萨作品给人的突出印象。略萨的每一部作品的结构设计都不雷同，各有特点。因此，他被誉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大师”。

鲜明的立体感是结构现实主义作品的特点。因此，结构现实主义作品也被称为“立体小说”或“全面体小说”(又译成“安全小说”)。这种“立体感”一是体现在作品的整体结构上，二是体现在对话上。在略萨的小说中，结构总是最大限度地参与了对主题及人物形象的创造。

结构现实主义经典之作《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全书共十章。第一、五、八、十章完全由“多镜头、多角度”的对话写成；第二、四、六章全是公文和文件（第二章是潘达雷昂写给军需首长的两个汇报文件；第四章是海、陆、空部队的公文；第六章是关于“劳军队”服务期间所发生的各类事件的汇报；第三章是潘的妻子写给她的妹妹的一封信以及潘的一个梦境；第七章是广播电台节目；第九章是地方日报对“巴西女郎”被杀经过的披露和评论。

为了反映组织劳军队一事，略萨采取了独特的叙事格局。从陆军、海军、空军的高级军官，从劳军队组织者，从士兵、妓女、地方人士、家属等多方面交待了事物的过程，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加强了从各种角度叙述情节的立体感。

《绿房子》也被认为是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他采用的是“通管法”(暂且这么叫)，他将聂威斯的故事、伏屋的故事、安塞尔莫的故事、鲍尼法西亚、利杜马、阿基里诺等人的故事互相交错，而后缝合为一个整体。象试验室中的九条通管，各带着不同的化学液体在试瓶中汇合，产生化学反应。这种写法使读者从城市到林区，从平民到军队，从各个侧面和角度了解到一个立体的社会。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是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单数章节里介绍了上大学的18岁的略萨与离过婚的、他舅妈的妹妹32岁的胡利娅的恋爱故事。而在双数章节里(第二十章除外)竟然独立地作起短篇小说来，其故事情节又与单数的长篇小说全无直接关联。

略萨曾说：“伟大的小说不是去抄袭现实而是把现实解体而又适当地加以组合或夸张。这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要把现实表现得更富于多面性。”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的双数各章的短篇故事是一幅幅社会风俗画，将它们连贯起来看，便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社会舞台。主人公就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出一幕幕绘声绘色、动人心弦的话剧。

我们从对以上三部作品的结构介绍中可以看出，略萨小说的结构明显地趋向于复杂，趋向传统结构的环环相扣及严谨和谐的反面——松散。这种"板块式结构"，取代了传统梯子形结构的刻板程式，它可能代表了整个世界现代小说结构发展演变的真实状况。我国新时期小说也受到很大影响。如从《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娟)，到《巨鲁》(周立武)，再到《大刘庄》、《小鲍庄》(王安忆)、《商州》(贾平凹)。正是这种看似松散，实质上是完整和谐的结构加强了小说的立体感。

略萨结构现实主义艺术上的立体感，还表现在电影蒙太奇式的对话上。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转换镜头的方法，把时间打碎，将空间切断，然后交错杂糅，跨越时空，以表现丰富的社会生活，达到透视的效果。如：

"你偷了他不少钱吧，伏屋？"阿基里诺说道。

"五千索尔，堂胡利奥。"堂法毕奥说道，"还有我的护照，一套银制餐具，我算完蛋了，列阿德基先生。我知道您会往坏处想我的，但我可以发誓，我要用我头上的汗水把一切损失补偿回来，直到最后一分钱。"

"你从来没有后悔过，伏屋？"阿基里诺说，"几年来我一直想问你这个问题。"

这是《绿房子》中的一段对话。在伏屋和他的同伙阿基里诺谈论如何偷了另一走私橡胶团伙的钱的谈话中切入了这一团伙的两个成员法毕奥和列阿德基的对话。这是用"钱"巧妙地组接在一起的，和电影里的镜头切换别无二致。

《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中有四章全部由这种形式的对话构成。对话的人物和时间地点都在不断变化着，好象摄影机的镜头，不但使人有视觉上的感受，还有听觉上的感受，在读者头脑中会出现一个立体形象。

略萨的立体化结构的小说，明显地造成了如下两种效果：一是缩短了作者、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进入并置身于当时的气氛中，邀请读者"参与"创作。就是说要求读者理清脉落，充分发挥想象力，同作者和人物在书中交流情感。二是节约文字，本来需要经过叙述或解释才能使读者跟得上的情节，只要人称一变，使读者一目了然，原来是变换了镜头。如在《潘达雷昂与劳军女郎》中，作者把三十万字才能容下的内容硬是压缩在了十七万字左右的作品中。可以说，这是一种浓缩式的写法，这可能是略萨独具一格的艺术特点。

（四）

"我叙述的是一群人物的故事而不是一个人物的故事，主要角色常常是以小集团身份出现的。"(略萨语)的确，略萨的作品大都以社会或社会集团作为作品描写或揭露的对象，很少去塑造一位主宰小说全部情节的主要角色，更没有那些对社会起着重大影响的英雄人物，相反，都是受着社会制约的芸芸众生。这些芸芸众生大都是拉美下层社会的人民群众，他们受剥削、受欺压、高贵的理性和高贵的感情被精神枷锁所禁锢。作品正是通过塑造这些典型形象来鞭笞社会、针砭时弊的。

综观略萨的作品，可以看到他笔下的芸芸众生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这个腐朽的社会的受害者、无辜的牺牲品。作品的任务就是要"抗议压迫，揭露矛盾，批判黑暗"。(引自略萨 1968 年 8 月 4 日在接受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文学奖时的讲话)《城市与狗》中的"奴隶"；《绿房子》中的鲍妮法西娅；《"大教堂"咖啡馆里的谈话》中的"谬斯"；《世界末日之战》中的胡莱玛，都是这样的人物。而《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中的主人公更是这样一种典型。他是一个将悲剧性和喜剧性融合为一体的人物。他本是一名模范丈夫，既不寻花问柳，又不嗜酒，作风正派，奉公克己，忠于职守。他无条件地听从上级的命令，故而被上级看中，派他去组织劳军队。为此，在完成这项极其荒谬的任务的时候，他死心塌地，一丝不苟地计算服务的次数，一丝不苟地尝尽春药。他遍走烟花柳巷而毫不以为羞耻。这些情节充满了喜剧意味。由于肩负的使命，他不能穿军装，只能着便服，还得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他的结局也是可悲的，他被当作替罪羊，被贬到了边远地区，可是他仍然不愿离开军队。我们说他是个受害者、牺牲品，但更可悲的是，他本人并没认识到自己已经被这个腐蚀人的军事机器异化了。从这点看他的命运又是悲剧性的。

从美学的角度来说，西方近代和现代小说的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五个阶段：即启蒙小说阶段、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阶段、现代主义小说阶段、后现代主义小说阶段、新现实主义小说阶段。新现实主义小说是现实与虚幻相结合、传统精神和现代手法相结合的作品。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便是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以略萨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流派，以对各种传统的兼收并蓄走在了世界文学的最前列。略萨不但继承了印第安文学的传统风格，而且还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一些表现手法，因而他的创作绝不是欧美现代派的翻版，而是具有拉美的特色：这就是深深扎根在拉美的现实土壤以上，以新颖独特的结构表现它。这或许是略萨对我们最有启发之处。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陈公望）